

人文  
学术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 艺术的本性

王元骧 著

The Innate Nature of Art

 復旦大學 出版社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执行主编 李 钧

王元骧 著

# 艺术的本性

The Innate Nature of Art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的本性/王元骧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1398-3

I. 艺… II. 王…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594号

艺术的本性

王元骧 著

责任编辑/黄 冲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91 千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98-3/I·911

定价:4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着手组织“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想起了十多年前由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那套大型丛书先后出版了三十余位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检阅。“丛书”从2000年第一辑（六本）出版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又有了巨大的进展，文艺理论的建设也继续经历了激荡起伏的进程。现在再编辑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可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考虑到出版周期的原因，“文库”计划先期出版十二本。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有成就、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远超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优先考虑“三〇后”“四〇后”学者加盟这套“文库”，但即便如此，目前只能有十二位学者入选，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再能陆续出版。

入选“文库”的这十二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理论文集，记录着每一位作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感受到的深切体验，所获得的宝贵感悟，所留下的坚实脚印，以及靠着艰辛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虽然无法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成果，但至少也可以折射出它的部分光影，勾勒出它的大致轨迹，对今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或有些许参照价值，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缘故。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令后来者怀想的年代。启蒙的激浪，保守的潮汐，新生的欢欣，怀旧的惆怅，都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心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正名”“回归文学自身”的呼吁，冲破了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工具的禁锢，重新发现和

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学界学习马克思《巴黎手稿》引发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全国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先后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步框架，为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贯穿上述种种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则是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虽然当时及以后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但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一代学人的亲身经历，它实际上塑造了文艺理论家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较之于他们的具体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

经过新时期前十年的理论积淀后，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被积极引介到中国，一种迫切想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现代性冲动也成为国内文艺理论家们挥之不去的情结。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同时以哲学和文论的名义登陆国内理论界，就是一个富于意味的信号。由此带来的研究格局也显得流派纷呈，思潮更迭，这是转型期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必然表征。90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主阵地尽管不在文学理论领域，但最初发动是在文学界。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勃兴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巨大冲击，造成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危机，引发了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反思，由此才催生出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话题。经过这场大讨论，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在多个向度上向纵深发展：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审美意识形态论”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成为文学理论建构中深层次的思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吸纳始终在争议中前行；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今；90年代末，文艺理论界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的流变历史和经验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历史的反思，寻找继续前进的正确路径……整个90年代，中国文艺学在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诸种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哲学解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方法不断涌入，并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进而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展开，有些研究方法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修辞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的建设，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时代终于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现代性焦虑在趋深，中国文学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转移着学界的注意力，成为新一轮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与此相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下，围绕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掀起新的波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家的自觉追求；对西方文论借鉴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冷静和辩证，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 90 年代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转向了务实的尝试和实践，在古代文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可喜的实绩；文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建构和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文学作品生成和传播的格局，向传统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成为当代文艺学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显得更加沉稳，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于这三个时期的始终。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标准，从美学的和史学的，到人民的、美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和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种把当代文艺理论要么看得危机重重、漆黑一团，要么说成完全是始终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搞全盘西化那一套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所编辑的这套“文库”中的十二本论文集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还远远不够

充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在其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总序中曾经预言，“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收入丛书的众多论文集，“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21世纪的前十五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编辑的“文库”，同样希望能够作为当代文艺学的一部分思想资料，“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照、启示和借鉴。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能够在我国人文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今天推出，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里，我们必须专门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孙晶博士。是她首先主动向我们提出建议，出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她的远见、魄力和眼光令人敬佩。在此，我们代表“文库”的十二位作者，向孙晶总编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们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不能不为“文库”的作者之一、我们敬爱的童庆炳先生的猝然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以他今年4月亲自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的出版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朱立元 曾繁仁  
2015年国庆节

## 自序

本文集所收集的大概是我迄今为止所撰写的 160 篇左右论文中自己感觉较为满意的一半左右,内容包括文学理论和美学两方面。

因为我觉得文化包括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是不会脱离原有的基础从零开始的,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我也总是力求把创新与守正结合起来。具体的说,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我研究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反映论,因为我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不可能主观自生,说到底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只是反对把“反映”看作是一种物理现象,而认为文学作为作家所创造的一种艺术美,是以作家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情感是人们对于事物的一种态度和体验,它基于认识又不同于认识:从客体方面来说,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为作家感动了的的东西,才能成为他所反映的对象;从主体来说,体验不同于认识,认识是理性的、是主客二分的,而体验只能是在主体的亲身介入、切身领悟中发生,它本质上不属于事实意识而是一种价值意识,其中必然包括自己的选择和评价、理想和期盼。这两方面都表明作家不在对象之外而就在对象之中。文学的性质就是由审美反映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产生的,它的价值在于通过作家的审美评价把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寄植在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让人在苦难中看到希望而在幸福中忽于沉沦,为人的生活充实心理能量和增添精神动力。所以我认为它的性质不仅是认识性的,而且更是实践性的,它不仅服务于“知”,而且更作用于“行”。这就决定了一个文学作品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它的价值都还是潜在的,只有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为作品所感动为作家所征服,而把作者的人生理想转化为读者的人生理想、读者行为的内心指向,它的潜在的功能才能转化为实在的功能。这样,我们对于文学的研究也就突破了以往仅仅着眼于创作和作品的视角,而把读者的阅读也纳入到研究的视域,不仅从实体的视角,而且还从功能的视角来看待文学的价值。这是既立足于反映论,又是反映论文艺观的“破茧化蝶”,走向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

而美学研究方面与文论不同,我的出发点则是本体论。本体论所研究



的是事物的终极根源的学问,对于美学来说,也就是事物对人来说为什么是美的,不过认为这不应像古代美学那样,离开了物与人的关系,只是从事物形式的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等实体属性方面来找原因,而认为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只能是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中去寻求答案,因为正是由于生产劳动,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从“自在的”变为“为我的”,与人疏远的变为亲和的,从仅仅是利用的关系而变为同时是欣赏的关系,它才有可能对人来说成为美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研究中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但这只是为我们研究美学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并非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的审美现象。所以要建立一门完善的美学理论还需要我们从社会、历史维度研究的基础上向个体的、心理的层面深入。由于我研究美学主要是从人学、人生学的角度切入,所以在心理层面上,我主要也是从人格心理学方面,结合审美教育问题,即美在人格建构的作用方面作一些探讨。因为以往的美学关于美在人的心理建设方面的作用,主要是从感觉论方面,从悦耳、悦目方面着眼,重在感性的价值,这虽然合乎日常经验,但仅以此为标准,我认为也容易导致把美浅俗化、娱乐化;其实从人的深层心理来看,美之所以使人喜闻乐见更在于它体现、应和和满足了人们内心的一种期盼。这就使得审美判断并非只是出于感官的享受,更是基于人的精神需求,由于体验到现实中美的存在而使人在精神获得抚慰和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它是一种人生的宗教。所以我认为美总是带有经验和超验的二重性质,它不只是感官的对象、更是人的心灵所趋。西方中世纪美学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把美分为“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并认为“不可见的美”高于“可见的美”。这虽然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倒是很能给人以启示而弥补我们以往审美心理学研究的不足。

以上所谈的只是我对文学和美学的一些基本想法,它未必都充分体现在本书所选的这有限的 20 篇文章中。我之所以在这里作一些简单的说明,希望能对读者朋友阅读我的这些论文提供一个总的思想背景,对于理解具体文章的思想精神会有一定的帮助。

美与艺术是不可分离的,艺术既是人的审美经验提升和物化,又是美学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所以我把这组论文取名为《艺术的本性》。“本性”乃是事物所固有的和应有的性质。这种见解在今天正被有些学人冠之以“本质主义”而加以批判。但我始终认为与任何事物一样,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是由它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我们要认识什么是艺术,就像要认识任

何事物一样要了解它的审美特性。“反本质主义”者认为这样必然会导致因渴望共性、普遍性而藐视个别性和差异性,这在我看来完全是源于对“本质”的误解,而事实上“本质”只不过是为我们正确认识的需要而对事物所作的一个简单的规定,是认识事物的指导原则而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现实中所存在的事物都是具体的,所以真理也只能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具体之所以具体,就在于它是“多种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事物当作抽象的、孤立的存在,而要把它放到一定的关系中去进行认识。所以在理论研究中,观点与方法总是统一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唯此它才不致于成为一种教条而是指导我们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智慧。所以,我们在学习理论时还须要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样,我们的理论才会是鲜活的、富有生机活力的而不至于成为僵死的东西,使原则所包含的内容在分析具体问题过程中得到充分激活和全面展开而成为具体的真理。比如,我们说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美之所以令人喜悦,就在于体现和应和了人们内心对于美好人生的一种期盼,但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唯有塑造了理想的人物,表现了美好的人生愿景这作品才是美的,这还必须联系作家自身的条件,如他的生活积累、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乃至他处身的文学潮流、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去作具体分析和评判。在优秀的作品中,即使是对苦难的声诉或罪恶的抗议,也同样能体现美的精神,给人以美的享受,因为要是作家对美好人生没有热切的期盼,他心目中没有一个美的理想,他就不会去描写人世的苦难和对人间的罪恶产生抗议的激情。这不就是把美的共同性、普适性与个别性、差异性统一起来了?

能通过本书再次与读者朋友见面、交流使我十分高兴。但要是没有本丛书主编朱立元、曾繁仁先生的关爱,我是没有想到要编这本集子的。本书能得以顺利出版,先得要好好谢谢他们二位,但愿这集子的学术质量不至于辜负二位先生和读者朋友的期望。

2015年2月16日

# 目 录

自序	001
----	-----

## 辑一 文艺理论研究

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与理论的选择 ——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	002
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	021
文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042
关于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考	049
创作与体验	065
论人、文学、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	083
我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解	095
评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论视界”与“审美论视界”	109
审美反映与艺术形式	119
谈文学语言研究的出路	130

## 辑二 美学研究

审美自由与人的解放 ——兼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144
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	156
再论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	168
康德美学的宗教精神与道德精神	188

论国人对康德美学的三大误解	203
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223
梁启超“趣味”说的理论构架和现实意义	241
美育并非只是“美”的教育	250
拯救人性：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	264
育人何以不能没有审美	277

## 辑一 文艺理论研究

- ◎ 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与理论的选择  
——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
- ◎ 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
- ◎ 文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 ◎ 关于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考
- ◎ 创作与体验
- ◎ 论人、文学、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
- ◎ 我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解
- ◎ 评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论视界”与“审美论视界”
- ◎ 审美反映与艺术形式
- ◎ 谈文学语言研究的出路

# 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与理论的选择

——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

## 一

我国自古以来缺乏理论思维的传统，所以按照理论思维的规律来研究文学问题，还是“五四”前后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就西方文学研究的历史来看，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仅形成了古今之别，而且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里，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文学研究中至少有这样三种模式：即规范型的、描述型的和反思型的。

“规范型”的研究模式源于古希腊。由于古希腊哲学主要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它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创立，他们针对当时流行的“智者派”（一译“诡辩派”）把知识看作都是相对的：“对于我来说，事物就是向我所呈现的那个样子；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向你呈现的那个样子”的观点<sup>①</sup>，认为虽然具体的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但由于“生成的事物是从某个本原生成的”，而“本原的事物是不属于生成的”，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不变的。它不是能凭感觉而只能凭思维才能把握，“如果着眼于存在而不变动的东西，将此作为范型，那么由此创造出来的事物，必然是完美的；如果他仅观照变动不休的东西，并把它们作为被创造事物的范型，那么由此创造出来的事物是不完美的”。所以在求知活动中我们就应该从一般出发去进行推理，“在推理中寻找存在物的真理”<sup>②</sup>。这思想后来也

---

① 转引自[古希腊]柏拉图：《克拉底鲁篇》，见《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见《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4—375页。

为亚里士多德所肯定,他把“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看作苏格拉底的两大贡献<sup>①</sup>,并经过他的发展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一大特色,深刻地影响了自古希腊至18世纪欧洲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亦即规范型研究模式的形成。所以要分析和评价规范型文学理论,就不能不关涉到希腊古典哲学。

“规范”是人的一切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文学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如同康德所说“每一艺术都是以诸法规为前提的”,“没有先行的法规,一个作品永远不能唤做艺术”<sup>②</sup>。就文学理论研究来说,如文学的本质、形式等,都可以看作一种对文学活动的规范,它们作为作家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升的成果,不仅是每个作家创作所应该遵循的,而且读者也只有按照这些规范才能理解作品,甚至连以反传统著称的尼采也认为“每一种成熟的艺术都有许多惯例作为基础,因为它总是一种语言。惯例是伟大艺术的条件而不是它的障碍……”<sup>③</sup>所以豪泽尔认为在作家、艺术家中,即使是那些“反对习俗的‘造反派’,自己也是用祖辈的‘习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因为不这样做,人们就无法理解,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sup>④</sup>。但另一方面,文学生产毕竟是一种创作而非制作。创作就需要有创造性,那种陈陈相因、机械重复的东西总是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而缺乏吸引力。所以对于规范,我们也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原则,它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灵活的、创造性的运用,而不应该把它当作一种教条,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循规蹈矩地按此进行。而规范型的理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却不幸地正陷入这一境地。

之所以会这样,首先是因为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奠基的希腊古典哲学在反对智者派以相对主义来否定知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时,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以强调本质来否定现象;不认识本质是不能脱离现象而存在的,它总是与现象处在一定的关系和联系之中,就像黑格尔所指出的“本质不在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而即由于本质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实际存在就是现象”<sup>⑤</sup>,它需要我们联系具体的现实关系才能对之做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所以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要是像柏拉图的“理念论”那样把本质看作是脱离现象而永恒不变的,那么就必然会背离丰富多彩的文学实际陷入思辨形而上学,而使之变为僵硬的教条。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页。

②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3页。

③ [德]尼采:《强力意志》,见《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8页。

④ [匈]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⑤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2页。

其次,文学是以感性的形式反映现实人生的,对于文学来说,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在古希腊哲学的真理观看来“一切科学都以恒久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或者是经常存在的东西,这里绝不包括偶然性”,认为“偶然性的存在是不具原因和本原的”<sup>①</sup>,所以在看待文学问题时,也都强调普遍性而轻视个别性,以致以“类”的样本来要求作品中的人物。这最先表现在贺拉斯以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于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的性格特征的分析为依据,在《诗艺》中要求作家在塑造人物时也必须按年龄一般特征进行,而“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唯此才能获得“观众的赞赏”<sup>②</sup>。这思想后来又为布瓦洛的同名著作所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西方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所推崇的“类型说”。这种观点到了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衍化为典型性就是阶级性,完全以普遍性、一般性来否定和抹杀特殊性和个别性,以致庸俗社会学在理论界猖獗一时。

再次,由于对希腊古典哲学这种普遍主义的思想原则的崇拜,把“理智看作是万物原因和安排者”,而视“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于是只有凭借推理才能“找到存在物的真理”<sup>③</sup>的思维方式也被带到文学研究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文学理论界被视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路径,并按被歪曲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为文学创作和批评制定法规。这突出地反映在对“真实性”和“典型性”这两个问题的理解上:认为真实性就是对生活本质规律的揭示,生活的本质是光明的,所以反映生活阴暗的方面就是对生活的歪曲;典型就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人的一般性就是社会性、阶级性,这样能否在人物身上完善和充分地体现他所属的阶级和阶层的特征,也就成了衡量某一人物是否典型的根本标志,以致在创作中脱离生活实际完全按抽象的阶级定义来如法炮制,在批评中,就把典型人物看作只是阶级的代表,他必须最充分地体现一般,否则就不是典型的。

这种思维方式曾突出地体现在周扬的某些评论中,对于《老工人郭福山》的评论可见一斑。小说描写郭福山的儿子,一个铁路工人的领袖、党支部书记郭占祥,由于过去特殊的经历所以听到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就感到害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见《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6页。

② [古希腊]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46页。

③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见《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205页。



怕；这使得他的非党员的父亲郭福山深感愤怒，要党支部开除他的党籍。但总支书仅仅撤销了他的支部书记而保留了他的党员身份。后来在郭福山的影响下郭占祥消除了恐惧飞机的心理，父子都成了英雄。对此，周扬作了这样的批评，认为“作者不只歪曲地描写了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形象，而且完全抹杀了共产党员的教育和领导作用。似乎一个模范共产党员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老工人；似乎在最紧要的关头，决定一个人的行动的，不是他政治觉悟的程度，而是由于某种原因所造成的生理上、心理的缺陷和变态……似乎使一个共产党员改正错误的，不是党的教育，而是父亲的教育”<sup>①</sup>。由于这样一种批评方式的垂范，结果导致文学评论似乎无须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只需记住一些原则和教条，不必对人物、环境、事件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复杂的关系作具体细致的分析，把一些观念和原理当作如同形式逻辑中的大前提那样，按照三段论法推断出的结论，就可对作品进行评论、做出判决。这岂不是要求把文学都当作公式、概念？生活的千差万别和丰富多样又从何说起？这种思维方式后来在郭开批评杨沫的《青春之歌》，武养批评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中都得到延续的反映，以致人们误以为理论就是法规、条条、框框，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而使理论在我国变得声名狼藉，令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如前几年有学人把“理论工作的程序”看作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某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就像“先掘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那样，其结果就必然会“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现象”，去寻找“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文学语言结构”。从而提出只有文学理论的“终结”才会有“文学批评的开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基于误解基础上对于文学理论所生的新的误解！

## 二

到了近代，由于古希腊的以所谓“永恒真理”来设定世界的思维方式被看作是一种独断论而受到质疑和批判，文学研究的范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原先的“规范型”而逐步向“描述型”和“反思型”转变。

“描述型”的研究是着眼于现存的事实，认为只要通过对事实的陈述就能

---

<sup>①</sup>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